

中国民族史研究

(第一辑)

尤 中 主编 王文光 副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史研究>>编委会

尤 中 林超民 张鑫昌

杨寿川 方 铁 王文光

目 录

锐意进取 再现辉煌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巡礼····· 方 铁(1)

民族历史

商朝及其境内外的民族群体····· 尤 中(7)

新出元碑杨孝先墓志考释····· 方龄贵(18)

大理国里堠碑三通道考····· 方 铁(33)

隋唐两朝与突厥的联姻····· 杨德华(50)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的民族识别····· 王文光(60)

怒江地区土司建置沿革考····· 肖 迎(70)

明代云南的丽江木氏土司····· 王 璞(83)

论安恩溥····· 潘先林(95)

五十年来洱海区域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李东红(109)

民族文化

三皇五帝之外的远古龙氏族部落考····· 杨正权(124)

略论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文学····· 傅光宇(139)

云南水族宗教文化浅述····· 王晓珠(150)

试论彝族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 王明东(159)

民族经济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杨寿川(169)

宋代云南与川黔桂的交往及交通····· 陆 韧(182)

-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农耕文化与政治统合····· 刘 刚(197)
论明代屯田制度对云南彝族社会经济的影响····· 华 林(208)
大理国农业探略····· 刘云明(223)

民族政策

- 中国历代王朝民族政策体系结构探析····· 郑 文(234)
南诏民族政策浅论····· 谷跃娟(256)
再论民族主义与苏联的解体····· 谢国先(286)

习作园地

- 日本“寻根热”与云南稻作文化的起源····· 张丽剑(301)
浅论共同心理素质的纽带作用····· 范永春(314)
大理周城白族饮食文化研究····· 张曙晖(321)

博士论文提要

- 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
····· 博士研究生 林超民 (335)
····· 指导教师 方国瑜 江应梁
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年历及其与元蒙政权关系的研究 ·····
····· 博士研究生 方 慧 (345)
····· 指导教师 江应梁
十四——十七世纪明代汉傣关系研究 ·····
····· 博士研究生 董咸庆 (348)
····· 指导教师 江应梁
唐代西南少数民族与唐和吐蕃的关系 ·····
····· 博士研究生 刘小兵 (352)
····· 指导教师 江应梁

明清时期壮、汉民族融合问题研究	博士研究生 苏建灵 指导教师 尤 中	(355)
明、清时期“山瑶”与“民瑶”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	博士研究生 陈 斌 指导教师 尤 中	(358)
古代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百越民族群体的源流研究	博士研究生 王文光 指导教师 尤 中	(361)
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述论	博士研究生 万永林 指导教师 尤 中	(364)
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及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	博士研究生 杨德华 指导教师 尤 中	(366)
西南古代彝族档案史料研究	博士研究生 华 林 指导教师 尤 中	(368)
元朝以来云南怒江中上游地区的民族	博士研究生 肖 迎 指导教师 尤 中	(370)
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	博士研究生 林谦一郎 指导教师 林超民	(372)
明代云南各民族的社会生活	博士研究生 谢国先 指导教师 尤 中	(375)

锐意进取 再现辉煌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巡礼

方 铁

《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一辑)终于面世了。这是由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编辑的论文集,其中不乏熟虑缜密之论,同时也有研习学步之作。《中国民族史研究》以探讨中国民族史(侧重西南地区)有关问题为宗旨,主要刊载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欢迎全国学术界同仁赐稿,计划今后一至二年出一本。我们相信,这棵学术园地中的幼苗,在大家的呵护和帮助下,一定会茁壮地成长,将与周围的诸多花卉,共同装扮学术界绚丽的春天。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虽有若干不足,但于我们自己,却是十分珍视的。她不仅是 we 献给 1997 年的一份礼物,而且表明了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全体同志所具有的锐意进取、再现辉煌的决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出版,不啻是吹响了向未来进军的号角。

云南大学研究民族史,开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时至今日,经过了数代学人不懈的努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内地一批大学和研究机构南迁,推动了云南的学术研究。方国瑜先生与凌纯声、徐益棠、楚图南、闻宥、向达、徐嘉瑞等一些专家学者,在云南大学文史系创办了西南文化研究室,发行季刊《西南边疆》,并出版属《西南文化研究丛书》的著作十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云南大学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1955 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云南大学时指出:云南大学应结

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云南大学历史系当时已设置了云南民族史教研室。至1959年，增设了中国民族史专业。1964年成立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室。1979年，成立了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1981年首批获准设置中国民族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后又获准设置博士学位授权点。1984年成立西南古籍研究所。1988年从历史系分出成立了档案学系。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云南大学汇聚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历史与现状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学者。他们是：白寿彝、楚图南、凌纯声、徐益棠、闻宥、向达、方国瑜、徐嘉瑞、杨堃、江应梁、李埏、马曜、缪鸾和、尤中、何耀华、林超民、张鑫昌、黄惠焜、张文勋、熊锡元、木芹、杜国林、杨寿川、傅光宇、张福三等位教授。在众多学者中，一些人已调离云南或离退休，还有一些人已经谢世。但是，这些专家学者所进行的工作，为今天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树立的学术丰碑，将永远载入史册，并为后人所景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大学在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成绩突出，硕果累累。一个大学的学科研究群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堪足告慰先辈在天之灵。四十余年来，我们共出版学术著作近五十种，合计约一千万字；发表学术论文一千篇左右。研究深入的领域，包括了中国民族史、西南地区民族史、西南边疆地区史、云南地区民族史和地方史、西南地区文化史和经济史、中国民族档案文献研究和云南古籍整理与研究等诸多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学术质量，一些论著还属填补空缺之作。迄今有七项成果获国家级奖。1995年国家教委首次组织全国高校进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云南省有四项获奖，其中三项为云南大学从事民族史教学的教师获得。此外，云南大学还有二十三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云南大学还承担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重要课题的研究，与中

国社科院和国内一些知名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合作与联系，和美国、俄罗斯、日本、泰国等国也有经常性的学术交流。

1995年6月，云南大学正式批准建设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这也是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唯一确定近期建设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者。云南大学的这一重要决定，标志着云南大学在中国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以预计，云南大学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依托档案学系和历史学系，联合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西南古籍研究所，以及本校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其他人员，组成阵容可观的研究队伍。在已确定的四十一名成员中，有教授十一人，副教授十五人，讲师十人，初级研究人员五人。论学历结构，有博士八人，硕士十九人，还有七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平均年龄39岁。

从1995年至2000年，中国民族史学科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一个方向是中国西南民族史，包括西南地区民族史、西南汉民族史、西南民族族别史、西南民族关系史、西南跨境民族史、西南地区开发史、西南地区经济史、西南民族文化史、西南地区文献学等内容。西南民族史方向由博士生导师林超民教授主持。另一研究方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包括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中国古代民族识别、中国民族政权史、中国民族档案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中国民族政策发展史等方面。中华民族发展史方向由学科领导小组组长、博士生导师尤中教授负责。

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的总体目标是：经过共同努力，使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水平，为我国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总体目标可分解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把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民族史方面国家重要课题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基地，博士培养点

“三位一体”的学科。1996年，云南大学已顺利通过国家教委“211”工程的预审。国家教委负责人在视察云南大学时指出：云南大学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办出特色。云南是地处边疆的多民族省份，云南大学对民族史的研究，具有起步早、基础好、研究队伍比较整齐等特点。根据云南大学的具体情况，学校领导把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这给民族史学科全体同志以极大的鼓励。只要我们群策群力，踏实工作，实现“三位一体”的目标，是可以做到的。

（二）推出高质量的著作与论文，将学刊《中国民族史研究》办成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物，总体研究水平在全国同类研究中居于前列，使云南大学在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方面的优势，扩展到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进而形成云南大学学派。

最近，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已制定了发展规划，在近期和中期发展目标中，拟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获奖计划等均已分解落实到个人，1996年学校下拨的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也已基本到位。从工作进展情况来看，是比较顺利的，并已按计划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对实现重点学科发展规划，完成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同志们充满必胜的信心。

（三）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硕士和博士，向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输送从事中国民族史教学与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云南大学有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三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十二人；在校学习中国民族史的博士研究生有十三人，硕士研究生有二十二人，研究生中有来自日本、美国的留学生。1996年，属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系所，又获准设置民族学、民族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与中国民族史学科合作的校内相关研究生学位点还有：专门史硕士点与博士点，设有中国民族经济史研究方向；国别史硕士点，设南亚东南亚史研究方向；文艺学硕士点，设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硕士点，设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方向。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还与贵州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院校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993年，在西南片区第一期硕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查评中，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获A等级。从查评结果和毕业生工作单位反馈的信息来看，云南大学培养的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在“211工程”建设期间，云南大学包括中国民族史专业在内的研究生教育，当有较大的发展。在条件基本具备以后，中国民族史学科准备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在云南大学设立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后流动站。

（四）出版成系列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国民族史课程的教材。

云南大学除招收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外，还在历史系、档案学系为本科生开设中国民族史内容的主干课和选修课。在各个层次的民族史课程建设方面，有关系所历来是比较重视的，目前本科生主干课和大部分研究生课程，已有本校教师编写并正式出版的教材。计划在2000年以前，配齐中国民族史方面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重要课程的正式出版教材，以利于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并满足国内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对中国民族史方面教材的需要。

（五）建成一个资料比较齐全，管理手段比较先进，属国内一流水平的中国民族史资料中心。计划在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的基础上，陆续增加两、三万册书刊，实现微机检索与编目管理，购置必要的设备，制作一批音像资料和教材，建成计算机室并投入使用。

除以上几个主要的方面以外，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还要积极扩大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目前历史系、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共同组建的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就是云南大学与国家级研究单位进行学术合作的一项积极的尝试。工作站遵循不要编制，不设专职人员，经费自筹，以课题带动科研的原则开展工作。自建站以来，云南大学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召开了云南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问题研讨会，并根据制定的科研规划，于1995年、1996年两次对云南边疆进行了专题联合调查，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将于1997年推出《中国边疆研究通报》（云南专号）论文集。对类似的学术合作，应大力提倡和支持。我们欢迎国内外研究机构，就共同有兴趣的课题，合作进行研究。

以上是借《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一辑）出版发行的机会，对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在这里，衷心祝愿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及其学刊，兴旺发达，再现辉煌！

商朝及其境内的民族群体

尤 中

（一）商朝的建立及其覆亡

《史记·殷本纪》说，商的始祖契的母亲简狄是“有娥氏女，为帝喾次妃”。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有娥氏的部落在后来唐朝时期的蒲州（《史记·殷本纪·正义》），即今山西临猗县至永济县一带。这个部落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史记·殷本纪》又说：“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传说中的“五帝”即黄帝、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虞舜，都是炎帝和黄帝族群中的代表人物。商的始祖契的母亲简狄乃“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说明有娥氏是炎黄族群中的一个部落。契与夏禹为同时人，在夏禹建立夏朝的前夕，契被舜封于商，即今河南商丘。看来，有娥氏的部落自帝喾至虞舜的时期仍在流动迁徙，最后才定居于商。定居于商之后，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于是这个部落的首领契的“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这时候，夏禹建立了夏朝，商仍保留自己氏族村社或部落组织以接受夏朝的统治，为夏朝东方的诸侯之一，是华夏民族中的一部分。

夏朝时期，商族仍在迁动。《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集解》说：“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迁国都’。”即自契至汤共传十四代约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凡八次迁徙。可见这个群体内部还不十分稳定。《史记》又说：“汤始居亳，从先王居。”《集

解》说：“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商汤从商丘迁至亳。即从今河南商丘迁至今山东曹县。于是，《史记》说：“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仍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昆吾是夏朝统治下的另一个氏族部落，其地在今河南许昌市东部。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为虐政淫荒”，引起了各氏族部落的反抗，于是，商汤趁机伐桀，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

商朝时期华夏族中的农业、手工业较之夏朝时期有很大的发展。甲骨文中的物、𠂔即犁字，可见当时农业生产中已经使用牛耕。农业中既然使用牛耕，足以说明牧畜饲养业的发达。手工业的种类很多，殷墟中发掘到了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很高，生产工具已经是青铜器。然而，商业看来还不发达，因而大的城市还没有出现，还难以寻找到一个理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汤至盘庚传十代而迁都五次，即两代人就作一次迁都。频繁的迁都正是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都城才最后稳定下来，商朝即此亦称殷朝。

商朝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夏朝时期余留下来的华夏族内部的氏族、部落界限逐渐被突破。甲骨文的使用，反映了华夏族内部文化上的逐渐统一，原始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众多氏族、部落语言在统一文字的帮助下慢慢消失，但也还不曾完全消失。

商朝疆域沿袭于夏朝而又略有扩展：东至海，西及陇山，南过淮水，北达燕山。⁽¹⁾商朝向原来夏朝统治领域以外的非华夏的其他民族地区扩展。《诗经·商颂·殷武》即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享。”说明商汤曾不断向原夏朝西部边境外的氐羌聚居区扩展，把一部分氐羌部落纳入商朝统治的范围内，迫使其按期贡纳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甲骨

文中有“来羌”、“伐羌”、“击羌”、“多羌”等字。武丁时，又曾不断向南部的苗、蛮地区征伐。《诗经·商颂·殷武》说：“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音抔）荆之旅，有截其所……维女（音汝）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所说的荆楚是夏朝时期三苗中的一部分，至商朝武丁（高宗）之时，率兵“深入其阻”，部分苗蛮部落被纳入了商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北方则向过去夏朝统治所不及的“鬼方”部落群发动征讨。《周易·既济》说：“〔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则“鬼方”的一部分部落群体被商朝征服了，商朝把北部边境拓展到了燕山。东部则在今淮水下游和山东沿海一带的东夷各部落散居的“夷方”被全部征服，而且夷方的部落人口还被迁徙到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去。⁽²⁾商朝也和夏朝一样，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有一些非华夏族的民族，也被纳入了商朝的统治区域之内。商朝的统治方式和方法，盖沿袭于夏朝时期而又有所改进。《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尚书·商书·仲虺之诰》说：“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赐）王勇智，表征万邦，纘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即奉“天命”继承夏禹以来的疆域和制度。看来，商朝仍在全国范围内划分区域，按不同的地方情况进行统治。夏朝时期的“甸服”是帝的直辖领地，亦称之为“畿”。商朝亦复如此。《诗经·商颂·烈祖》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宋人朱熹《注》说：“止，居。肇，开也。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过千里。而其封域，则极乎四海之广也。”也就是说，商帝的直辖领地不过千里，而其所封建的诸侯则遍及全国各地。商代封建的诸侯爵位已分等级。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爵位，都见于卜辞。其中，侯国最多，如蒙侯、攸侯、杞侯、周侯、丁侯、犬侯、禾侯等；其次为伯，如易伯、宋伯、郕伯、羊伯等。所谓“诸侯”、“多伯”，就成为众多邦国的统称。子、男之属，如微子、箕子、毕子等，为畿内的“多子族”；雀男为

附庸小国，徐子为比较边远的东夷之国。各大小方国的诸侯要向商帝定期朝贡，提供劳役，奉命征伐，遵守规定的礼仪制度，成为商帝统治下的臣属之邦。而每一方国，又都按照帝室建立的政权机构，组织军队，设置监狱，征收赋税，统治其封域内的人民。⁽³⁾非华夏族的贵族分子之接受商朝封爵者，其内部的各种制度与华夏族诸侯统治区内不一样。对于非华夏族的诸侯，商朝一般是沿袭夏朝时期“因其故俗而治”的方式方法。

• 商朝自汤建国，至纣共传十七代三十一帝。⁽⁴⁾至纣暴乱而国亡。《史记·殷本纪》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仓库名）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正义》：沙丘台在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更对诸侯们进行压制。于是，西部诸侯姬发（周武王）“遂率诸侯伐纣。……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商朝亡。《史记·殷本纪·集解》说：“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商朝存在的时间约为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之间。

（二）商朝统治期间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

（1）文字的发展 由于农业、手工业，乃至商业的发展和政治上的需要，文字的创制较之夏朝时期发展更为迅速。殷商时期，人们迷信鬼神，一切行为都要通过占卜向鬼神祈求指示。人

们将占卜的行为和言辞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形成了甲骨文。殷墟出土带有文字的甲骨十多万片，连同其他器物的铭文，约有单字四千多个。后来汉字的基本结构，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等都已具备。它为后来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⁵⁾王力在《中国文法初探》中归纳出汉语词序的九种规律，对照甲骨文，仅第八种“被动态”为殷代卜辞所未有，其余八种，均完全或者基本相同。汉字、汉语以其独特形式、风格千古相传，甲骨文委实处于起例发凡的地位。在表达社会方面，甲骨文也生动地展示殷商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据郭宝钧统计，甲骨文中关于人类、人身、人伦、人的活动的字，占总字数的 20%；关于动物、狩猎、畜牧的字，占 17%；关于植物、农事耕作的字，占 15%；关于天象、气候、时间的字，占 9%；关于山川、河流、方位的字，占 7%；关于战争、兵器的字，占 8%；关于服装的字，占 1.7%；关于居住的字，占 6%；关于交通的字，占 3.6%；关于文化的字，占 1.4%；关于娱乐的字，占 1.7%；关于宗教的字，占 3.6%；关于数量、物性的字占 3.6%。据此可以看出：殷商时期，中原的华夏族对于自身的认识已很深入，制字亦多。天象、气候、动植物、劳动产业等直接关系人类的生存、繁衍，故字数占相当比例。由于受到物质文化发展的制约，文化娱乐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字数也少。关于宗教活动的字数虽然只占 3.6%，但甲骨文绝大多数是记载卜辞或与占卜有关，这一类字的使用频率极高。⁽⁶⁾

(2) **文学和史学** 殷商时期既有比较完备的文字，所以也就产生了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大量文献。而由占卜积累的大量甲骨卜辞，只是当时文献记录中的一部分。殷商有专职的史官“作册”，使之成为文献典册加以收藏。这种文献典册不少，它既是历史资料，也是文学作品，但由于年代久远，大都散失。《尚书·商书》只是幸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今存《尚书·商书》十七篇。其中

《盘庚》上、中、下三篇可以确信是当时遗留下来的。三篇共一千三百零九字，文字简练，语言生动，记言记事，一气呵成，既是很好的散文，也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3) 宗教信仰 殷商时期的华夏族和夏朝时期一样，在宗教信仰方面是崇拜天帝，迷信鬼神，一切行动都是奉天之神命，须祈求鬼神的指示。《尚书·商书·汤誓》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当时商汤发起对夏桀的讨伐，而商民则以为妨碍他们的农业生产而不愿从汤伐桀。商汤乃将自己讨伐夏桀的行动说成是出于“天命”。“予（商汤）畏上帝”即畏天帝，不敢不执行“天命”而讨伐夏桀。《尚书·商书》各篇，在谈到自己的一切行为之时，都无不归之于“天命”、“天道”、“上天神后”、“上帝”。《尚书·商书·伊训》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即人的吉凶祸福，都是由“天帝”、“上帝”在那里作主。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崇拜天，崇拜“天帝”、“上帝”的原因。信仰鬼神的道理也和崇拜天帝一样。《史记·殷本纪》说，纣之所以灭亡，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慢于鬼神”。为了表示顺从天帝、上帝的意志，祈求鬼神的指示，乃有占卜。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来取得天帝、鬼神的指示。占卜的方法是将龟腹骨和兽骨钻孔火烤，出现的裂纹称为“卜”，依据卜的形状来解释和断定人事的吉凶。从事占卜和对卜的形状进行解释的专职人员即巫史。巫史既掌握文字，又有较广博的知识，所以能够对卜的形状依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他们的各种各样解释就是卜辞。这些卜辞形成文字，刻在龟壳和兽骨上，这就是保留到现在的甲骨文。

(4) 科学技术 商朝时期，华夏族中继承了夏朝时期重视测天象的传统，殷墟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天象的记录。其中除常见的